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体育的负面影响

孙庆彬

(西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分析,在肯定儒家思想价值的同时,认为儒家思想对中国体育存在负面影响:重道轻器的儒家思想导致重文轻武思想的产生,阻碍了体育的发展;儒家的礼教损害了体育公正性和娱乐性的需要;儒家思想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压抑人的体育潜能和创造力;贵和谐、尚中庸的儒家思想扼杀体育的大胆冒险精神。

关键词:儒家思想; 体育; 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4)06-0139-03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SUN Qing-bi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nfucianism, the author confirms 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Confucianism has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n PE in China: stressing theory and despising practice, Confucianism brings the idea which stressing theory and despising practice and impedes the development of PE; Confucian ceremonies damages equity and entertainment, reduces energy of PE; stressing collectivity and despising individual, Confucianism oppresses the peoples' potential and creativity in PE; stressing harmony and middle, Confucianism reduces the spirit of adventure.

Key words: Confucianism; physical education; China

中国对现代体育的诞生贡献甚微,风靡世界的现代体育发端于西方国家。中国古代的蹴鞠类似于足球,有人便认为足球是中国的发明,同样的道理,有人把中国古代的捶丸说成是现代高尔夫球的雏形,认为高尔夫球是中国发明的,但所有这些都缺乏可靠的史料佐证。即便上述说法被证明属实,为什么蹴鞠和捶丸没有在近代被发扬光大传播到海外,而是近代西方的足球和高尔夫球传入中国?

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对现代体育的诞生没有建树?其根源在于中国体育的文化土壤——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奏谏起,儒家思想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后儒家统摄道、佛等诸家思想的精华,至宋明时期,儒家又融汇佛、道智慧,在人伦与“天理”之间巧妙搭桥,将伦理固化为不可违的“天理”,形成具有哲学高度的新儒学(又称宋明理学)。经过千年的风雨涤荡,儒家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溶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固化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态和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国

家意识形态”^[1]。诚然经过千年积淀的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体育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资产,像“刚健有为,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贵和尚中”^[2]等对中国体育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便深受儒家思想的惠泽。但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对本民族的发展都有制约性的一面,儒家思想也不例外。

1 重道轻器的儒家思想导致重文轻武思想的产生,严重阻碍体育的发展

儒家思想重道轻器。儒家倡导“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观,以实现儒家“仁”的理想。“内圣”修身重“道”,“外王”经世重“器”,若二者均衡发展,本无缺陷。但儒家人生哲学的重心在“内圣”,认为“仁”是人的内在本体,人性本善,仅靠“内圣”便能成仁,“外王”只是“内圣”成“仁”后的必然逻辑结果,这样,从儒家思想的源头便滋生出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孔子“君子不器”的言论流露出的正是这种思想。至宋明理学之后,重道轻器的倾向更趋明显,“内圣”进一步压倒了“外王”,儒家的实践性进一步弱化。与儒家一脉相承的理学家

收稿日期:2004-03-15

作者简介:孙庆彬(1966-),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认为：“向内便是圣贤之城，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途”，将“内圣”之外的自然认知和实践技能贬抑为“愚”和“不肖”，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宣扬：“大端惟在复身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由此可见，在儒家文化中“道”、“器”失衡，尽管儒家也强调“经纬天地而裁官万物”的本领，但从儒家思想总的价值取向以及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历史现实而言，其重道轻器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重道轻器、重理性轻实践必然导致重文轻武思想的产生，这是由体育(古代也称“武”)的实践特性所决定的。重文轻武思想对中国体育从文化根基上造成了巨大伤害，使中国体育始终处于低层次的、从属的、工具性的地位，难以上升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的地位。一千多年来，中国人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视武学为不齿，社会上的佼佼者无不埋头咬文嚼字，除了拿笔之外，几乎不从事任何体力活动，虚弱被奉为有涵养和生活悠闲的标志。在儒学创立之初，培养精英还包括御、射二项体育活动，后来这些课程被抛弃，其结果是一代又一代弱不禁风的中国精英潜心苦读圣贤书，从事体育活动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玩物丧志。北宋之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日盛，从武的军人地位低下，朝廷中武官的地位远不及饱读经书的文官。宋朝惩罚罪犯的一种严厉方式是“充军”，甚至兵役要被毫无尊严地在脸部刺以“鲸文”(“鲸文”又称“涅文”，被民间视为是一种卑贱耻辱的标识)。尽管历史上曾数度出现过强武之政治，唐代甚至开创了武举制的先河，但总体上，任何朝代都没能抗衡儒家思想的强势影响而扭转重文轻武的社会心态。匈奴、契丹、蒙、满等尚武民族甚至一度凭借其强盛的武力入侵征服中原，但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原文化被外来骑射文化征服，而是外来骑射文化对中原文化的皈依。

2 儒家的礼教损害体育公正性和娱乐性，使体育的活力丧失

儒家思想倡导礼仪，使中国成为文明之国，礼仪之邦。儒家弘扬礼仪的初衷或许是为了维系人伦，以达至社会文明，但由于儒家“礼”的基础是宗法伦理，“礼”被后人代代强化，以至成为具宗教色彩的礼教，则具有了压抑人性的一面。早期的儒家伦理是“人理”，注重的是道德约束力，宋明之后，理学家将伦理固化为超自然的、具有强制性的“天理”，大大加强了礼教的约束力，使其更具有了摧残人性的特征，这恐怕是倡导弘扬人性的儒家始祖孔子所料想不到的。

儒家礼教阻碍体育发展的根源在于其强调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损害了体育的公正性和娱乐性，束缚了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依据儒家伦理，君臣、尊卑、长幼、男女等差别自然地形成人们地位的高低。地位的不平等必然损害体育的公平、公正精神。如比赛或游戏中参赛者的尊卑会造成体育活动的“礼让”现象，必然有损体育的公平、公正原则，降低体育的娱乐性和观赏性。许多古代体育活动被用来“扬礼”，如礼射、御(驾车)、投壶、蹴鞠、捶丸等项目的规则皆包容一定的礼节，许多礼节缺乏公正性。儒家礼教还规定，女子不能外出参加体育活动，严重剥夺了女子

的体育权利，扼杀了女子的运动需求，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犹存。

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本应是文明标志的礼仪被扭曲异化为束缚和戕害人性的苛刻礼教，在这样的国度里，怎能诞生出以对抗性、竞争性和公正性为特征的现代体育运动？由此，古代的中国蹴鞠没能成长为现代足球而走向世界也就不足为怪了。

3 儒家思想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必然压抑人的体育潜能和创造力

在中国思想史上，对群己关系的定位，儒、道各执一端。儒家主张由“成己而兼善天下”，道家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走向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体逍遥。儒家所强调的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价值观因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而受到多数人的认同。

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重群体的原则表现出相当的积极意义。“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古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殚精竭虑，福泽众生。但对群体价值的过分强化易导致个体价值的弱化，抑制个体价值的充分发挥和多样化发展。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宣称“己者，人欲之私也”，将“己”、“欲”视为等同，进而要求“大无我之公”，个体价值被全然否定。久而久之，必然导致个体的潜能和创造力退化。

西方心理学家认为，淡化个体价值将抑制人的行为能力，影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根据多年的研究证明，人的行为是由内驱力驱动，内驱力的大小取决于动机水平，而动机水平最终是由人的需求决定的。人有哪些需求呢？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5个层次，处于最高层次的便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3]。可见，人的行为要受自我实现的需求情况制约，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必然导致个体潜能的非正常发挥。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突出个体价值，故而体育在西方国家发展为现代体育，展示出巨大的魅力。在尊重个人价值的西方文化沐浴下，西方人执着地参与体育运动，他们喜欢在运动中追求对生命价值的体验，热衷于挑战自我、表现自我，在自我实现的满足中升华、抚慰自己的心灵。反观中国历史，在重群轻己的文化价值主导下，体育健身娱乐的功能被异化为军事、政治的工具和附庸，最终造成千百年来我国传统体育沉闷凝滞、发展迟缓的结局。

4 贵和谐、尚中庸的儒家思想扼杀了体育的大胆冒险精神

中国传统艺术皆强调和谐与平衡，认为事物的和谐是美的最高境界。和谐思想广泛运用于音乐、美术、建筑、工艺，甚至政治谈判、社会矛盾调节以及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在维护中国统一的多民族政权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对体育而言，和谐中庸的思想也同样重要，“人体各部分是和谐结合在一起的完整的整体，身体动作和谐时便最省力、最有效率”^[4]。贵和、尚中作为东方文明的

精髓,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堪称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极具普适性的哲理。

但儒家的和谐思想,是以“中庸”观点为理论基础,以“礼”为标准,以对矛盾统一体的长久保持,对竞争观念和行为的抑制为特征的,它有一种倾向:力图使矛盾双方达成的平衡经久不渝,永不超越“中”的限度,这就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因而蕴含了保守的成分。

中国有句古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它教诲人们严禁冒险,使整个社会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极力寻求安全感。中国人酷爱无肉体危险的娱乐活动(如棋、牌等),而不愿外出从事危险性活动(如探险、登山)。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国成了一个缺乏阳刚的“阴”性国度——温和懦弱,不愿冒险,害怕变化。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国家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阳”性文化,把冲突和竞争变成了文明进步的沃土,把冒险精神变成了人类智慧的甘霖。在西方,体育运动名副其实地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

因循儒学的中庸之道,不愿冒险是我国体育发展中的致

命弱点。要想中国体育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须营造一种尊重个体价值,鼓励在体育领域适当冒险的人文环境。

中国体育应批判地继承儒家文化,努力克服儒家思想缺陷,消除其对体育的负面影响,积极借鉴世界先进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从中吸收营养,以促进中国体育的健康发展。同时,中国体育应发掘民族传统体育的潜能,用体育固有的阳刚和激情滋润中国的文化土壤,促进中国体育与中国文化共同成长。

参考文献:

- [1] 崔大华. 儒学引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31
- [2] 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77.
- [3] 施良方. 学习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82.
- [4] 卢元镇. 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高级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48.

[编辑:邓星华]